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一五期 ——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11d)

【史海钩沉】文革中的十一月 唐 郎
【亡灵祭坛】母亲的早逝 心 楚
编者小启：本期稿挤，周孜仁“红卫兵小报和我”暂停连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中的十一月

• 唐 郎 •

◇ 一九六六年

1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重申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使文化大革命夭折的路线。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消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有200万人被接见。林彪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谈到文革中的“大民主”时说：“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份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1 1月8日，周恩来、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份学校红卫兵代表时，周批评“北医红旗”组织说：你们给陶铸同志贴大字报，标语，共七个标语贴到陶铸头上合适不合适？……他要把第4号人物揪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见他，我不同意这个口号。不只是我不同意，毛主席也不会同意。……大民主应该有个界限，在最大民主的基础上应该有集中，必要的集中还是要的，八·八《十六条》公报是毛主席审定的，新的政治局常委是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

1 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1 1月10日至1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七次接见各地到北京大串联的红卫兵。毛泽东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次接见采用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的方式。

1 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陈毅说：“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作路线斗争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斗争中，我不赞成现在的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这就是错误的，就是逐步升级。搞校党委不过瘾，还要搞部长，现在还要搞副总理。要有多少是多少，实事求是。作路线斗争要有一定限度，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本来不错，超过界限就是犯错误。”徐向前讲话说：“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提批评，解决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地安排找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份注意这一点。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这样搞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叶剑英讲话说：“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两次、三次地承认错误，挨打挨斗。有些单位，如二医大做得过份了，变成了错误。领导运动的人掌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温度。”“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情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 1月14日，戚本禹、姚文元接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派”部份学生。戚本禹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虽然宣告失败，但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斗争不会风平浪静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会甘心失败。在北京不是听说“秋后算帐”吗？现在已经秋后，“秋后算帐”看来算不成了。冬后会不会算？冬后算不成春后会不会算呢？他们还要给革命派算帐。所谓算帐就是复辟，就是反攻倒算，执行他们的路线，重新镇压学生。……“秋后算帐”其实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攻倒算的口号，如果我们不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是要算帐的。

1 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三（2）班学生刘振忠、张立才两人，在清华大学贴出了一张署名为伊林·涤西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原文见本刊z k 9 9 0 3 d——编注）。同年12月20日，北

京市公安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将作者逮捕，直到1968年9月释放。

11月15日，王力、戚本禹接见外地来京工人代表时谈关于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王力说：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工人发动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很好的事情。我们感到工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大势所趋，任何人不能阻挡的。我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全违背主席的指示的；很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问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力，怕什么？有什么害怕的！戚本禹讲话说：最大的问题是工厂的领导怕革命，怕群众就象怕老虎，想把群众压下去，压制的理由是“生产”，拿这顶帽子来压人，最关心生产的是工人，是群众，他们总想把生产搞坏来压你们，以此来刁难你们。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生产和革命关系。而生产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生产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几千年来生产就是在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建设的呢？是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两条路线的斗争。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联。从11月21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进行革命串联的师生返回原地。《通知》还要求各地要作好徒步串联的试点，以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联作好准备。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所作的补充规定有：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1966年5月16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过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受到党的严厉处分。二、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三、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11月17日，全国计划、工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开了工交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说：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到工交企业的特点，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应当强调：一、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二、工交战线开展文化大革命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三、坚持8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四、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搞跨地区的串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国务院业务组组织有关部门起草了《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文化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但《十五条》尚未定稿即受到批判并被否定。

11月17日下午，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等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时，王力在会上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12条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厂矿领导要和群众在一起，对一小撮蜕化变质、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并且敢于发动群众批判自己的确错误，绝对不能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群众斗群众。”“过去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工人一律平反。”“文化大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文化革命的领导机关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组织不能背后操纵，必须按巴黎公社的选举制，经群众的充分酝

酿反覆讨论，实行全面选举制，并且可以随时更换和改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革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要坚守自己的岗位，绝对不能放弃生产劳动，成群结队的到外地串连。”

1 1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重要通告。通告的内容是：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人。这样做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份。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说：北京市委1 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

1 1月24日，周恩来就中共西北局请示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给毛泽东写信：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的信，请阅，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决定的，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但他们如有新材料，可送来中央查处。据说，南开大学学生曾从高仰云（南大副校长）家中抄出一些自首材料。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同日，中共中央对中共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作出批复：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26日，中共中央就同一问题复电中共东北局并中共吉林省委，电报说：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 1月25日和26日，毛泽东连续两天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共约250万人。

1 1月27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会议由牛晓平主持，参会者大多数是干部、军队干部子弟。会议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1 1月28日，周恩来修改和审定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成都拟来北京情愿工人的电报，强调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周说：欢迎你们派代表（小厂一人，大厂二至三人，总数不要超过三百人）来北京商谈。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来北京情愿，既不利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希望：在省、市委和厂矿企业的领导方面，要保证不得解雇工人，不得扣工资，不得打击报复，不得用党籍、团籍来威胁工人；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1 1月28日，北京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陈伯达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江青、周恩来也先后讲了话（讲话全文见本刊zk0211c——编注）。这次大会，被称作是中国“革命文艺大军向文艺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所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发动总攻击的誓师大会。”

1 1月29日，陈毅、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现在的斗争，我非常耽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单位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我很耽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斗争的目标很不明确。不要把

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路线斗争怎么斗法？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搞路线斗争，不要简单化、扩大化。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叶剑英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冲击中南海、国防部的作法。陈毅、叶剑英的讲话，后来遭到了军内造反派的批判。

◇ 一九六七年

1 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腾海清担任革委会主任，吴涛、霍道余等担任副主任。被宣布打倒的内蒙古党政领导人为乌兰夫、王逸伦、王锋。1 1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表示祝贺。

1 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肃清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1 2月，毛泽东对文中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说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 1月5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到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有些党员官做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党纲要修改。”“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 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3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1 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文章由陈伯达主笔起草，经毛泽东亲笔批改审阅（全文见本刊zk0211c——编注）。同日，北京举行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集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人出席了大会，林彪作了讲话。讲话说：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新时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不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而且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问题上，划时代地、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

“毛主席以他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胜利地领导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11月9日和12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份单位的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江青均发表了讲话。11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江青的讲话。

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说：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中央同意广州军区就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中央认为，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通知》要求：一、各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机关、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目前一律不搞“四大”，已经开展“四大”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结束。二、军以下部队和各基地以及中央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如总参三部、军委三局、五局，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总后各办事处等），仍坚持进行正面教育。三、已经批准开展“四大”的军队院校、文艺、体育、科研、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四、人民解放军要认真地做好爱民工作。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应该高姿态地向群众作公开检讨，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五、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

1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很好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做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广西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韦国清在“文革”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不坚持错误，能诚恳地检查，态度是好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已批准他的检查。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在“文革”中立新功。二、中央批准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同意和支持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希望切实贯彻执行。三、广西处在抗美援朝的前线，要做好“支左”和抗美援朝工作。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等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整理了各地对召开“九大”的意见和反映，主要内容有：“九大”的根本任务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选举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委员会；希望“九大”前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6卷；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修改党章党纲，批判和肃清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流毒。党章要突出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建议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作出新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代替有错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应当发展一批、清洗一批，把隐藏

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建议用毛泽东关于接班人5个条件和林彪关于选拔干部的3条标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王明之流绝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政治局特别是常委中，不能有反面教员。”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九大”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九大”规模要大，人数要多。要多选一些部队、工人、贫下中农和红卫兵的代表参加大会；贯彻“精兵简政”方针，党和国家相同的机构可以合并。

11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说道：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11月2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召开北京工人座谈会，江青在会上讲话说：“历次革命运动，起初总是学生先起来。但决定革命命运的从来不是学生，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江青还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问题，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

11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山西分裂为两大派，武斗日益严重的问题，批评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促进革命大联合。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提出关于晋南各派立即停止武斗的6条协议：立即停止武斗；立即撤走从农村及外县调到临汾准备参加武斗的全部人员；任何群众组织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民兵、公安机关的武器弹药；不准抢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粮食、粮票、财物；要归口闹革命；保证正常的民主权利等。

◇ 一九六八年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分配工作应当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一般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不一定要分配到自己所学的专业部门去。分配当普通农民的学生，各地可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硷地、兴修水利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

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11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说道：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说来，对工人运动说来，对学生运动说来，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壮大发展说来，再有5年的时间，就会比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经23年，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吗？其实，在二次大战以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 一九六九年

11月1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尸体火化时用的姓名是刘卫黄。

◇ 一九七〇年

1 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规定：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担任。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社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六、中央旧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后来，康生生病，李德生调往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工作就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负责。

1 1月6日至20日，周恩来与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作了五次谈话，谈外语教学的问题。周说：对建国17年来的外语教学工作“要一分为二。不能把合乎毛主席思想合乎规律的也否定了。”“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外语教师也好，外事工作人员也好，总是要练，要允许人家抽空练。”“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语教材有一个问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这个问题局限性太大，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1 1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中谈到对外援助时说，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在谈到国内经济形势时，毛泽东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年周折才学会了一点。例如，有一年北戴河会议，提出一年要搞1800多个建设项目，结果财力和物力都不够，要什么没有什么，没办法就砍，一砍，又砍得太多了，只剩下800项。毛还说，有些项目搞得越来越大，叫“大、洋、全”，而我们通过实践提出搞“小、土、群”，后来一扫而光，现在又搞起来了。钢铁工业这几年总在年产钢1000万吨到1800万吨之间徘徊，徘徊了十年还是上不去，现在许多人觉悟了，今后有可能上去，但是不要太急了，急了会吃亏的。现在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番。

1 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了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各单位应由主要的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指示》发出后，中共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为“批修整风”运动）。

1 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道：“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可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到1971年9月，解放军540个师以上机关，4

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都进行了野营训练。1970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二十天到三十天。”此后的数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指示，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 一九七一年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讲他（指参加会议的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关于庐山会议的斗争，毛说：“《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 一九七三年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批吕不韦的“折中主义”，是评法批儒运动中一篇典型的文章。

11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谈到林彪说：1971年9月，林彪自己跑掉了。其实，林彪这个人，我跟他打交道有几十年了，合作的时候也有，很少，对立的时候很多。他是亲苏联的，他准备搞政变。总而言之，他没有出路，向北面去，这就是一个证据。打日本的时候，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他在苏联。在苏联发表文章，拥护蒋介石，根本不理共产党。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说：要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问题同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那就复杂了。中苏之间1959年就闹翻了，1958年开始闹翻，他们要控制中国的海岸和军港。我跟他们的大使谈话几乎拍了桌子，臭骂了他一顿，他报告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就来了。那时候他提“共同舰队”，苏联和中国搞共同的海军。赫鲁晓夫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那个时候相当神气，因为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苏联又要跟我们拉关系。苏联就是欺软怕硬，野心很大，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北部都想霸占。但它能力不够，困难很多。

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即朝阳农学院的前身）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开始宣传“朝农经验”。其主要内容是：一、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原选送社、队去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二、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三、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学习的范围，走向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生产队实践。《调查报告》认为“几上几下”是朝阳分院教学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而这个“乱”是“好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教育的新面貌。”

◇ 一九七四年

1 1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时，谈话说：我看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不讲和平……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看医生。有病，他就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1 1月10日，江青在得悉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后，也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人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当日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毛泽东”同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邓小平谈到江青问题时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我赞成你！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这个好！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咯。1 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我愧对主席的期待，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20日毛泽东再次给江青写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的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1 1月1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广州街头贴出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李一哲”大字报的序言和全文见本刊 z k 9 9 1 1 a 和 z k 9 9 1 1 c ——编注）

1 1月29日，彭德怀去世。

◇ 一九七五年

1 1月2日，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就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在评价上是三分不足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很多人讲迟群、谢静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要批走后门。批走后门只是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现在，只在口头上说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远新还建议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还应该对干部进行教育，使干部有正确的态度，干部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毛泽东同意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另一种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的，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毛泽东又接着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出

来。当天晚上，邓、陈、汪和毛远新开会。邓小平在会上说：按照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3月中央9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这些都可以考虑，就是上到我的帐也要从中央发出9号文件以后开始算起。从中央9号文件发出以后，全国的形式怎么样？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看。对9号文件以后形势的评价，毛远新同志的看法是否定的，是好是坏，要靠实践来证明。

11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关于头天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汇报后，指示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除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三人外，又加上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这样与毛远新共八人开会，先行讨论。毛泽东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还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毛要求八人抓住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

11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对当天召开的邓小平等八人会议的汇报情况后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也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大家的看法不见得一致。毛远新说，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这对团结有利。会议的目的，是不是要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毛泽东肯定地说：对。毛泽东还嘱咐毛远新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会前，毛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总的评价应该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1月30日，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介绍中国“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张春桥说：“清早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怎样估计。”这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12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载有张春桥谈话的《外交通报》。

◇ 一九七六年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布告》说：保定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根子就是“四人帮”。《布告》重申要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成立由秦基伟负责的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规定了解决保定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按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1月16日起，开始着手解决保定地区长期武斗的这一“老大难”问题，共拆除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了数以万计的枪支弹药，逮捕了21人。

11月11日，《光明日报》举行工农兵批判“梁效”文章座谈会，批判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同时，还发表了《首都工农兵愤怒声讨“四人帮”抛出的反党大毒草——本报召开批判〈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座谈会纪要》。

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解正”的文章：《“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黑纲领——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反经验主义为“纲”》。

1 1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人民日报》于23日头版头条转载。

1 1月24日,毛泽东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

1 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等方面揭发批判“四人帮”,指出他们是代表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号召把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

## 【亡灵祭坛】

### 母亲的早逝

• 心 楚 •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母亲痛苦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五十二岁。她那人为的早逝,是留在女儿心头三十年不愈的伤痛。

母亲是位不幸的女人,经历过离婚,丧子,饥荒和贫病交加的痛苦。她以固有的信念,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困苦与希望中顽强地生存,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将四个儿女培育成人。

一九六八年,正当她苦尽甘来,企盼幸福的晚景时,灾难却向她这位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良民病妇袭来,她没能闯过此后严酷的四年。在那不算太长的岁月里,写认罪材料,隔离揪斗,陪斗,强加于她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心理摧残前所未有。不得不去五七干校的母亲,在原劳改农场的土地上,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被人狠狠斗争,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在沉重的压迫下,在潮湿阴暗的茅草棚中被诱发开来。没有治疗,没有病假,病情加剧,卧床不起,无人理睬,还加上三个春秋不准回家与儿女团聚。

走进干校驻地的母亲是一个尚有代偿功能的心脏病患者,而三年后被女儿领走时,其心力衰竭已近三度,死亡向她逼近。那么她果真有罪,是威胁社会的阶级敌人吗?

### ◇ 困苦与希望中生存

一九二零年,母亲出身于一个官吏家庭,高中毕业后父母令其出嫁。父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婚后在省城以律师为业,母亲则协助他抄抄写写。一九四八年父亲有婚外情,对家庭的责任感淡化。在竭力劝阻无效后,母亲萌生离婚,自己抚养五个孩子的念头。考虑到母子六人往后没有可靠收入,征得父亲同意,将其老家田产卖了十亩作为日后生活补贴。(这一举动成为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间批斗母亲为地主分子的重要依据。)

解放后,母亲热烈拥护共产党。一九五一年,有人在报上提议城市居民在农村的田房产契约应寄往家乡农会,她立即把婆家所有契纸邮往老家。一九五二年母亲接受培训,成为一名财会人员,同年她与无回心转意的父亲正式离婚,开始独立供养五个孩子。

一九五五年八月,年方十七的大哥死于癌症,家中因此一贫如洗。母亲悲痛欲绝,极度的忧伤使她染上了肺结核。母亲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给予她极大的同情和关怀,在患病期间,

单位每月补助八元让她增加营养。感受到温暖的母亲从痛苦中挣扎出来。她明白，为了四个孩子的成长，自己必须健康地活着。医生嘱咐她一一照办，积极治疗，半年后肺空洞钙化，又全力挑起生活的重担。

一九五八年她调至科研机关工作，此时大跃进的号角声和超英赶美的宏伟蓝图令母亲振奋不已。在全民大办钢铁的浪潮中，母亲激动得要把家中正在使用的唯一铁炉当废铁交公。母亲认为，是新社会使她经济上独立自主，她力图对社会多作一些奉献。

当时我们兄妹四人都在念书，她月收入不足六十元。一九五九年，姐姐急性阑尾炎手术住院，负债一百多元，焦急的母亲陷入了更困苦的境地。周围有人同情，也有人讥讽她死心眼：为什么不让初高中毕业的儿女去当学徒？母亲态度明朗地说：只要他们愿意读书，我不能拦。她向我讲述过自己当年想上大学被家庭拦截的痛苦经历，鼓励我们好好读书。同时尽可能张罗哥姐们寒暑假在机关基建部门打小工，筹集学杂费。对于单位给予的十至十五元的困难补助，母亲的感激之情表现在她出色的工作上。

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年饥荒，食品奇缺，物价高昂。我们这一家犹如雪上加霜，饥寒伴随着我们的发育成长。为了给我们兄妹省下一点粮食定量，母亲只得时常以又苦又涩的水煮老包菜叶为餐；营养极度贫乏，脸腿严重浮肿，每月受检一次，“达标”后则得到一斤黄豆和半斤砂糖的票证，仍然与儿女们分享。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某农场劳动可得到三斤小麦的补助，母亲拖着虚弱的身体，星期日劳动了一整天，挣得了那份奢侈的报酬。

在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常常夜不能寐，思考怎样靠自己的能力支撑一家五口的生活。当她得知新疆与内地工资差别大，就毅然写信给新疆某部门，申请调往边疆，不过她没收到回复。一九六一年初，她在北京出差时发现患上了心脏病。医院诊断：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瓣闭锁不全。

生活的困苦，疾病的侵入，并没有使她精神上茫然。那时的政治是：蒋介石妄图反攻大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苏联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在机关礼堂里，每周都会有一个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或者英模事迹介绍。只要有会，母亲常常津津乐道地向我复述那些激扬革命斗志的报导。全靠着这些精神食粮，她把自己的小家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没有怀旧，没有牢骚，咬紧牙关与共和国一起共渡难关。

一九六三年春季的一天，我从住读的中学回家过周末。母亲告诉我，她星期五刚从医院住院归来。原来，几天前的一个午夜，母亲因感冒引发心脏病，心跳每分钟达95—100次，立即呼唤邻居。不一会儿，院内值班医生赶到。第二天一早又把她送进省立医院。母亲得到住院观察治疗，心中平静。她不愿影响我们的学习，因而没有通知子女。听到母亲的一席话，我从心底里感激那珍爱他人生命的邻里情，也庆幸母亲在一个爱护百姓的群体中工作。

作为一名财务工作者，母亲头脑清醒，账目清晰，同事们常夸奖她的工作。母亲身陷困境，在经济问题上却严格把住公与私的界线。她常说：无论生活如何苦，公家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沾。一九六四年早春时节，在单位清理制造假账贪污公款的集体案件中，加班加点查帐。过度疲劳使她心脏病复发，再次住院治疗。她是院内公认的两个重心脏病患者之一，一旦心跳超过每分钟90次，单位医务室就令她卧床休息。平时可以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也是众人皆知的。医生们告戒她：谨防感冒，克服焦躁，积极治疗，方可稳定病情。

正如母亲所期望的，困境总会过去，光明就在前头。一九六四年秋天，母亲兴奋地迎来了共和国的十五周岁，城市物质供应全面好转。而在我们的家庭，哥哥已大学毕业，姐姐正上大

学，小哥和我分别进了大学和高中，她自己的工资也长了一级，情绪激动的母亲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她决定彻底与“剥削”阶级决裂，把五二年与父亲离异时法院判给我们子女的十多平方丈地皮无偿地交给了政府。目睹着我们兄妹的成长，一些友人赞扬母亲有眼光有毅力，并提醒我们今后要好好孝敬母亲。

一九六五年秋天，姐姐毕业工作了。开始摆脱困境的母亲感到自己的家与国家一样在蒸蒸日上。从补充营养考虑，她订了牛奶。并常看医生，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入微，还坚持熬服中药。她深信自己今后一定可以和儿女一起度过幸福的晚年。

#### ◇ 身入囹圄

一九六六年夏季，文化革命开始了。长期无力涉入政治运动的母亲此时在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感恩之情和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她订阅人民日报及省报，认真学习各项政策文件，重要的话语勾上道道红记号。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鉴于不同的政治观点，运动把母亲推向了本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由于母亲有较好的写作功底，毛笔字书写流畅，该派转抄信息和发表意见的大字报全由她执笔。徘徊在大字报报栏的人们无不熟悉她的笔迹。

一九六八年初春，在市里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单位内“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舆论角逐愈演愈烈。正在这时，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保守派”中领导干部多，人事干部多，党团员多，出身好的多；而“造反派”则正好相反。出身不好的母亲已是出头鸟，自然首先被击中——“打倒地主份子某某！”的大幅标语出现在院大字报栏。目睹着火焰烧向母亲，停课在家的小哥和我明白祸从何起，央求母亲赶快缩头。母亲认定自己所为是在捍卫主席路线，毫无惧色。她觉察出对方组织要乘清队之机整垮她所在的群众组织，但是中央清理阶级队伍的战略部署又不容置疑，自己不能害怕考验。她坦然地写出了解放前后的生活来源，包括卖十亩地的原委情况。不久，以“保守派”成员为核心的清队专案组成立了，开始了有目的地外调。此后，她每天上班就是交待罪行或接受批斗，但还没有被关进“牛棚”（监视管制对象所在地）。

母亲在此期间认真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和那段时期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政策性指导文章。她记忆力强，有关政策条款脱口而出，她确信自己不是地主更不是阶级敌人。面对群众斗争，母亲不免苦闷，好在两个成年儿女在身边，可以倾吐衷肠。生活上我们全力照顾母亲。她的病状依旧是心跳控制在每分钟100次以下，心律不齐和心房纤颤无明显恶化迹象。在机关，同派别的群众渐渐疏远母亲，“造反派”的大字报也无人写了。我当时以为“醉翁”已达目的，是会偃旗息鼓的。万万没想到，一场摧毁母亲坦城个性为目标的斗争即在眼前。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身为“老三届”（1966，1967，1968所有高初中学生）的我得去农村插队。母亲接到机关通知要上省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搞斗批改。听到这消息，惊恐的一闪念在脑中掠过：繁重的农业劳动无疑会把母亲早早推向死亡。考虑到五七指示中明文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我怀揣“最高指示”走进了省卫生厅五七干校筹备处，反映了母亲有严重心脏病，长期在单位属于不参加体力劳动者，希望按政策把母亲留下。接待干部不作任何解释就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我的这一行动随后成为母亲抵制运动的罪责。两年后在我抽调回城的过程中，干校有关人士仍对我耿耿于怀，不肯放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离城去农村落户，母亲一人去了干校。她十分惦念我，常来信问这问那，至于她自己的状况多是轻描淡写。涉及运动，她总是说相信党的政策会在自己身上落实；

提到劳动，则说她干的是轻微劳动；说到身体，她声称还撑得住。一九六九年我回家过春节，盼不到母亲的归来，我预感到母亲的处境不佳，只能去信力劝她不要多辩白，否则会多吃亏的。对于儿女的忠告，母亲经常提出异议，她执著地相信一切美好的表白。她生性直率，有话不说，有理不辩，难上加难。我说服不了母亲，只是为她担忧。

年青的我，在农村从事笨重劳动之时，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患病母亲的艰辛，盼望干校运动早日结束，渴望我能回城继续与母亲一道生活。一九七零年三月，省城工厂纷纷下乡招收知识青年。我以自己的苦干进入了第一批招工名单，可是招工单位发往干校政干部门的政治审查要求迟迟无回复，为此我失去了当年六月首批回城的机会。母亲得知后伤感地说：只要你抽回城，我死也瞑目！母亲的极度不安和无可奈何使我意识到她的处境恶劣，否则她会去找人评理的。母亲和我都认为，干校有人仍记恨我当初要求母亲不去干校之事。此后，我给干校去了一信，诚恳请求他们宽大为怀，放我一条出路。然而同年十月份又一企业招工，仍不见政审回函。万般无奈，县区有关部门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我家几年前的政审材料，我终于获准在一九七零年的最后一天返城了。

我立即写信把这事告诉了热切期待中的母亲，深知母亲是个藏不住事的人，还特地提醒她不要向旁人透漏此消息。但喜形于色的母亲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如释重负地向人传送了这一喜讯，马上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事后，她在给我的信中简单谈及了自己的乐极生祸，并渴望月底回家过节。

一九七一年春节前夕，我是第三次在城里盼望与母亲共度佳节了。元月下旬我收到母亲沮丧的信：春节探亲假不批。于是我托人给母亲捎去了猪油，腊鱼和巧克力糖果，不料油和鱼被母亲请人退回。她告诉我：近期感冒咳嗽，痰多，不能吃这些东西。我猜测母亲犯病较以往更重，想去干校看望她，又顾虑那些对我不满的面孔会迁怒于母亲，就没成行。

春节刚过一月，姐姐收到母亲躲过监视发出的信。提及她的处境艰难，身体也支撑不住了，要姐姐速到干校，并叮嘱她下车后先去干校团部找有关领导谈谈，以缓和一下斗争气氛。姐姐遵嘱到了团部，批评母亲对群众运动的对抗态度。有关领导顿时高兴了，也许他们认为母亲终于被征服，其女儿前来求饶了。返回后，姐姐告诉我：两年多不见，母亲又瘦又老了，春节前因为我抽回城而表现出的兴奋，又受到了一场“击退阶级敌人新反扑”的群众斗争。在干校，心脏病正趋恶化的母亲每天劳动往返要行走24里路，气喘嘘嘘，极度吃力，又不能抗拒。超负荷的精神和肉体摧残使刚毅的母亲第一次在与女儿分手时哭泣起来。

岁月的流逝，疾病的加剧，母亲更加思念儿女。在以后的半年里，母亲不断地向连部团部递交探亲申请，终于在九月底获准，三年来第一次离干校回家。我在工厂接到母亲的电话，赶紧冲向长途汽车站。站在面前的母亲完全变样了：脚穿一双旧解放鞋，瘦黑的面庞，往日的衣裤在身上边走边晃荡。我的眼里瞬时涌出了泪水。母亲久别重逢的喜悦，顷刻间驱散了我欲言又止的忧郁发问。母亲说：你已参加工作，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一旦运动结束，我就提前退休。我高兴地接着往下说：和我住在一起，照顾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母亲会心地地点了点头。

在半月之久的休假里，母亲仍然很少谈论干校三年的经历，但是她告诉我，她的“政治问题”虽一直未下结论，可她并不怀疑，结论会是人民内部矛盾。母亲的归来使我感到“斗争”的火力已在减弱，而从母亲从未有过的消瘦和沉重的喘息声中又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

◇ 最后的时光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得知母亲病倒在床，我次日一早起程去了干校。下午二时，我推开了母亲所住的芦席棚，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见我来了，母亲脸上泛起了一丝虚弱的笑容。她告诉我，她已倒床一周了，就盼着我的到来。望着前后相距只有三米的排排草棚和无隔音条件的左邻右舍，我心里骤然涌起一股世态炎凉感：九年前有人叫医生，有人送医院，还是这同一个母亲，现已病入膏肓，却全然得不到人道救助。长时间的敌对渲染后，人际关系中仅剩下一道难以逾越的冰墙。

不容多加思索，我决定立即去干校医院。母亲一周来咳痰不止，心跳高达每分钟120次，睡觉时而不能平躺，举步维艰。我孤立无助，凝视着她对医生的渴求，只能尽力搀扶着她，心情沉重地向1—2里外的医院挪动。干校医院很小，条件简陋，住院部只有一个医生。我找到医生，请求让母亲住院。经初步诊断，医生认定病情严重，立即给母亲安置了病床。

安派就绪，打吊针，消炎止痰，加之药片治疗，2—3年没有得到过认真治疗的母亲经过医务人员一天的周旋，病情趋于缓和。我抽空在午后返回母亲住所。沿途炙热的春光照耀在沙土地上喷发出滚滚热浪，潮气浸湿了我的衣服。推开房门，却嗅到7—8平方米的屋里散发着阵阵霉味。高悬的太阳无法将阳光塞进狭小的窗洞。看着布满白霉的木板床，木箱，椅子，木盆，触摸着湿润的被褥，我明白了：虚弱的母亲无力抵御阴光潮气的侵袭……我把它们全部搬出门外，暴露在阳光下，并清洗衣物被单。偶尔我看到草棚周围有熟悉的身影和面孔从身边走过，但没人愿意与我直面对话。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母亲的房里，听着铁丝勾住的木板门中吹来的阵阵风声，我无法入睡。我思忖着是什么力量使惧怕风寒的母亲在此竟度过了三个严冬腊月——是对政策的信念？是对晚年生活的憧憬？

翌日一早我回到母亲身边，看到她正大口大口地咀嚼医生试用的一种据说能消炎的藻类植物——鱼腥草。粗糙的草根使她的嘴唇和口腔磨出了大个水泡。我难过地劝她停一停，她执意不肯。我理解，相信医生和为生存抗争是她的本能行为。我只能依着她，为她洗净更多的草根。

住进了医院，母亲满怀希望，配合医生治疗。我也以为会象往年两次在城里住院一样，不久她可平安出院。又陪伴母亲两日后，我把病中的母亲留给了医院，回厂上班了。

然而我太天真了。十天后我收到她在病床上写的信：“我每天要心悸两次，医生说瓣膜受损，心房纤颤已难恢复，肺部也受感染。现每天服中药，打青霉素B1，控制心力衰竭。心跳每分钟120—140次时太难受，只能注射强心针。我感到痛苦的是一切生活琐事都要自己动手，买饭站队，腿软得支持不住。很想回家。昨天我和医生谈了，医生知我无人照顾，说没有意见，关键在连队。”看着信，我悔恨自己的粗心，没有弄清楚母亲的病情就匆匆离去。我默默地期待着连部同意她的请求。

五月十九日下午，我又收到母亲的信：“连部扬某明今早（五月十六日）来找医生谈了。刚才医生告诉我，医院不同意我回城，显然变了口气。回家的念头只好暂时搁下。”快下班时，我收到干校八连发来的电报：“你母病危，速来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电报，我料到母亲生命危在旦夕，或许再也见不到她了。晚上我和哥哥去了长途电话局，拨通了干校医院的电话，知道母亲被抢救生还。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了去干校的车。走进病房，见母亲身体靠在撑起后背的病床上，脸色铁青，不停地咳痰。我的再次到来给母亲带来一丝安慰。她告诉我：“我盗汗不止，心力衰竭已经不轻。在干校医院几经危急，实在不甘心孤独地死去。”她坚决要求与我一起回家。我见不到决定给我发电报的任何领导，但我相信，此时没有谁愿意再把母亲扣下，为她料理后事。我把领母亲回家的想法告诉了医生，医生与干校领导联系后，同意母亲回城，但强调离开干校，医药



费很难报销。我那时已顾不上多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担忧母亲几乎不能行走，还能经受6—7小时的长途颠簸吗？母亲的明确表态增强了我的勇气。三天后我买了两张前排汽车票，向医院借了一辆自行车，让母亲坐在后轮货架上。前轮轻后轮重，我只得全力下压车把，推着车跑。看我吃力，母亲不忍地叫着：“让我下来走，让我下来走。”我跑一阵，停一阵，总算把母亲拖到汽车站。送还自行车，我们乘上了回城的车。母亲靠在我身上，我注意到极度虚弱的母亲，再一次在她憔悴的脸上显出生存的希望，或许她认为即使死在女儿怀里也无遗憾吧？长途行进中，面无忧虑的母亲十分默契。出乎意料，我们如愿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回到城里，子女常在身边，精神上无负担，固然比在干校形影相吊无人照顾好得多，但新的问题是不能公费看病，更谈不上住院检查医治。为医药费报销之事，母亲给连队领导多次写信，却三个多月杳无音讯。靠自己掏钱看病，母亲只能偶尔去看中医，取些药回来煎服。

那段时光母亲基本上卧床休息。她很想抱抱可爱的孙儿，也希望为与丈夫分居两地的姐姐带带孩子，还想见见远在山区的未来小儿媳，可是她什么也不能做了。九月初母亲的病情再度恶化，整夜不能平卧，只能背靠床框坐着。母亲将病情再次报告干校，中旬收到连部来信，同意她在市立一医院看病。但是母亲的病况日益危急，肺里的痰呼隆呼隆地吼叫，形势逼人，痛苦不堪。母亲逐渐意识到时间不多了，开始断断续续地向我们兄妹四人倾诉她的最后心声。记得她对我说：“人家的心脏病好得那么快，我的病为什么好不起来？我盼不到退休和你生活在一起了……”十月十六日我们电告干校，陈述母亲病危，三天后干校派许某梅来到母亲身边，在我们的要求下，来人同意母亲住院。此时绝望的母亲已不愿去医院。在我们兄妹的哀求下，住进了大医院。可是一切救助治疗都为时太晚了，六十个小时后，母亲奋力向我们兄妹告别，然后永远地倒下。

失去母亲的我无法接受母亲早逝的事实。我痛哭她的晚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悔恨自己的怯懦和自私，没有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多去干校照料，我悲愤她为流血的政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无人可诉。两个月后我取回了母亲在干校的遗物，人亡物在，倍感凄凉的我发现了母亲留下的数篇交待，认罪，申诉及思想汇报文稿，从中获悉不知晓的桩桩往事和日批夜斗后母亲的真实情感。它们把我带回了斗争的岁月……

#### ◇ 真实的史页

“二月九日在贯彻1。31文件的动员大会上团政委（编者注：干校编制效仿军队的团，连，排，班，主要领导来自军队）非公开地点了我的名：不承认是地主份子！不投降，还是现行反革命哩！感到压力很大。后来批斗其他人经常大会陪斗。”——摘自1969年4月稿

“二月份我连群众以地主资产阶级份子的名义把我当阶级敌人揪斗隔离已整整半年，还未落实政策。当然首先应该肯定，对我揪斗隔离是革命行动，也是当时我连革命形势所必需。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都已老实交待清楚了，没有丝毫隐瞒。解放前三年我在城市靠丈夫的小律师为生，从未以收租为生。解放后我把老家的田房地产交给了农会，难道这不是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不想变天，心甘情愿与地主阶级划清界线的真实表现吗？一九六四年又把在城里的地皮退给人民，不又是划清与剥削阶级的界线吗？有那个阶级敌人肯这样做或这样做过？至于参加工作十八年，从来没有任何反动言论。党把我的三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最小的也是高中生，我感恩报德都来不及，怎会成为阶级敌人？就真是地主份子，也基本改造过来。所以无论全面地历史地看，或专指哪一段经历都构不成地主份子，更不是真的阶级敌人。不得不斗胆再次提出。政治生命重于活的躯干，我想组织上和革命群众会谅解我的心情的。”——摘自1969年8月稿

“团部专案组负责同志：昨天上午送上材料后，下午开斗争大会时，团部派朱同志参加。我万分感谢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在斗争会上，专案组许某均根本不许我开口，提前后矛盾的事，想用压的方法让我再次口头和书面承认是地主份子。报上曾有评论说到外调人员如果带框框出去调查，势必按需要搞，那么真实性就有问题了。我敢说到今天为止，七连专案组还没有拿到我符合划地主份子的确凿证据。请求团部派同志来查阅外调材料（能让我见面更好），以便更好地掌握稳，准，狠的对敌斗争政策。感激之至！有空还望给我个机会来谈谈。”——摘自 1969年9月稿

“朱某加是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在我们五个‘一小撮’中他的罪恶比谁都大。可对他，王某平仅在‘一小撮’中批一下就没事了，许多群众不了解他的罪恶。他假装老实，用手腕获得了个别领导的信任，并在一九六九年二月第一个获得‘解放’。为此我联想过：如果是我犯了他的罪，那早就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斗的次数比我现在遭受的不知要多多少倍。朱的问题作结论后，他继续欺上瞒下，无中生有的小汇报使我吃了不少苦头。他对我进行侮辱性的谩骂，还口口声声专我的政，让我气愤不已。与他相比，我实在不服气，就去要求上级解决我的问题。前天晚上班里又特地举行了对我的斗争会，我知道这与不服朱某加的定案有关，就决定在会上向群众揭露他解放前后的罪恶和运动中搞破坏的事，说明被反革命份子专政不服，什么后果也不计了。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被揪斗地位，既无权在群众大会上检举别人，更不能以控诉者的姿态出现。那天晚上我刚讲一会，就被吼声制止，受到革命群众狠狠批斗。

我听到了愤怒的斥责声：‘你不是把矛头指向朱某加，而是指向革命群众和红色政权，对抗一打三反是现行反革命！’‘朱某加的事已了结，你对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满！’‘朱某加就是要专你的政，监督你！’‘把你戴上帽子送回乡下去！’‘什么东西！干扰运动大方向太猖狂，得狠狠斗！’王某平班长还说要在全连批斗。当时我很想不通，会后就写了那张犯下新罪的‘认罪书’。心想革命群众说你是对抗运动的现行反革命，与其七斗八斗，不如趁早承认为好。朱某加的问题那么严重，最后还是上不了纲。第二天早上去学习班，看到打击我嚣张气焰的大横幅标语和‘击退地主份子某某新反扑’的大字报，就决定把那张‘认罪书’交上去。完全站在个人立场，根本没想到这是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当然也坦言：我确实认为革命群众站在朱那一边。事实上朱某加的事已定案，与我的地位就是不同。下午下工回来看到针对我的大字报专栏，这个想法就更坚定了。今后怎么办呀？晚上找邓排长谈了一下，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只有等着再挨斗了。

昨天晚上王某华等四位革命群众把我从学习班叫出，指出：我本月八日晚写的那张‘认罪书’把革命群众打成包庇反革命份子朱某加的反革命，还逼真地把斗争会的经过写成群众的罪状，语言恶毒，比过去抗拒罪恶更大，更不可容忍，应受到更狠猛的批斗。”——摘自 1970年1月稿

“从一九六八年五月清理阶级队伍到今年春节，我与群众的分歧主要在认识上，所依据的事实并无大的差异。群众认为我是地主份子，我则绝对否认，并以平等态度辩解。但这并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中那个抗拒交待的情况。虽然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对我的揪斗太过份，我始终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在我的身上落实。”——摘自 1970年2月稿

“自己是批斗对象，两三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被取消了革命资格。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出身好的人形势大好，我的四个孩子形势也好，而我个人谈不上前途。将来再有运动，稍不当心，又是挨整对象。当然，党的政策是要落实的，最后会搞清我是什么矛盾。等运动结束组织上能让我回家，与孩子们一起生活那就好了。”——摘自 1971年4月稿

“春节不让回家，病假也不批，深感群众运动的压力。加之心脏病严重，整天劳动，真害

怕死在这里，还留个阶级敌人的称号，累及儿女，才被迫从表面上改变态度。

过去几年，我一直认为自己报纸看得多，对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得多，才敢于和群众顶。如果不看书，不读报，什么也不懂，也就不会和群众顶，群众的气也就不会那么大，问题可能会早一点解决。我现在才真正体会‘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含义。

连排班领导都教育我：过去对我的批斗没有错！解放前过剥削生活，吸吮劳动人民血汗，还死不认罪服罪，为什么不能批斗！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思潮，跳得高，清理阶级队伍中表现更恶劣，还能不批斗！叫我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有出路。”——摘自1971年5月稿

“坦率地说，某些不符合政策的问题要想通过压的方式是难以行通的，特别是思想问题。好在我现在不热衷于什么前途，说什么好听的话语也无用。归根到底，政策要兑现，是非即清楚。当班领导不批我的病假，我去连部反映情况时，刘连长说：目前除了政治上的待遇不同，生活上你可与革命群众一样了。”——摘自1971年8月稿

#### ◇ 沉重的思辩

三十年前刚刚失去母亲的我，没有勇气细细研读会令我心碎的母亲手稿。然而我毕竟从这些在经受精神和肉体折磨之后用心血涂写的“认罪”材料，看到了几幅历时三年针对母亲的严酷斗争场面。我害怕知道，也永远不想知道，在母亲挨斗的日日夜夜是否伴随着体罚和武斗。但那愤怒的威逼声，叫骂声，恐吓声，口号声汇集在一起，难以令人想象掌握母亲命运的人们会对她的病体施之人道。在各级基层骨干对母亲施行三年斗争后，准备结束干校运动前夕，竟然迫不及待地标榜自己象领袖人物一样一贯正确，迫害无辜者有理。所谓生活上可与革命群众一样，在布满仇恨种子的人际关系中，哪里见得到受害者的生存之地？

在遭受揪斗的年月，具有一定法律常识的母亲，虔诚地信奉最高指示和政策条文。她以为在政策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并以此作为依据，为自己的无罪充当法律辩护人，直到幻想破灭。母亲被当作敌人“服刑”四年之久，至死没人愿败露对她的“判决”。“先服刑”而“不判决”或“后判决”，这在法律上是件逻辑混乱的荒唐事。为争得一个理应给出的“判决”，我提起笔向干校发出请求：对母亲在运动中的问题作出结论。“判决书”总算来了，上面仅有一句话：“对某某的问题不作敌我矛盾处理”。看着这既无罪证又无政策貌似从宽处理的“判决”，联想起母亲被推向死亡的悲剧，我陷入了长久的思辩之中……

母亲作为“一小撮”的成员，从未奢望有一天别人会对她宣布“无罪释放”，她只望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倘若干校代表许某梅能在母亲临死之前公布以上“判决”，母亲会欣喜地领悟出自己抗争四年的政治结论终于到来，纯朴善良的心理会使她象那些临终入党者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欢呼政策的伟大，而含笑离去。强权者们长期肆意揪斗，拒不“判决”，甚至对一个行将去世者不给安息，不又是一种残忍和折磨吗？他们抗拒反省，更畏惧自己“莫须有”的迫害在受害者面前曝光。一直把握母亲命运的人们，从“红宝书”上，从文件上，从报刊上，本可极易找到划定地主，现行反革命的条文，但他们偏要信口雌黄，费尽心机地罗织罪名，从私有财产的自由买卖，到请佣人，打麻将，全都构成不可饶恕的剥削罪状，剥夺一位身患重病无依无靠者基本的生活权利及尊严和人格。其实斗争的策划者若拿得出自圆其说的证据，早就会在解放朱某加时，给母亲定出“敌我矛盾”的“判决”。反之，什么罪名都不成立，就是政治迫害，就应平反昭雪，向受害者家属道歉，赔偿损失。残酷斗争的组织者们唯恐承担逼人至死的责任，玩弄文字花招，构思出一个卑鄙虚伪的死后“判决”。它似乎要告诉受害者家属：被斗者有罪，死后予以免刑。洞察其奸，死后免刑的“判决”岂不荒谬绝伦！

三十年来，每当面对同龄人的母亲，我就会想到自己不幸的母亲。无尽的怀念，促使我苦苦求索，为什么母亲会遭迫害？我甚至曾经竭力寻找母亲的“不识时务”来抚平心中滴血的伤口。我思量，如果母亲从文革一开始就高枕养病，不介入政治，不参加派性组织，不动用笔杆去捍卫辩不明的路线，她会幸免吗？文革经历者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有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暴露和隐藏在群众之中。母亲“认罪”中提到的她班里的五个“一小撮”多是我熟识的称作伯伯，叔叔者。他们加上母亲代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敌对势力。后来朱某加走出“牛棚”，似乎还有增补者。百分之五的敌人出自何处？出自曾经叛党的自首变节份子，出自出生异己的旧中国过来人，出自吐露心声者，出自不服使唤的调皮者，出自你我他……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的遇难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口号和朱某加由“罪恶极大”到“无罪释放”曾向母亲表明，只有朱的性格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一小撮”唯一的求生之路。若要母亲像他一样在某些人面前唯唯诺诺，阿谀奉承，指鹿为马，无异去逼母亲死。自然界赋予民众千姿百态的性格，假若只允许特种模式的个性生存，异类得通通消灭，无怪乎有人会选择自尽作为反抗。而母亲那种不识尘世邪恶的申辩抗争使她经历更长久的痛苦，与不愿瓦全者殊途同归。

在母亲留下的“史页”中，我多次看到也曾是母亲同事我当年称为叔叔阿姨的一男一女的名字。他俩都是母亲所在派性组织的对立派。一九六八年机关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们对母亲的斗争就首当其冲，来势凶猛。

男将王某平文革前是机关大院子弟小学唯一的男教师，当时年约三十出头。文革开始后大胆造反，摆脱了一些男士不愿从事的小教行当，挤进了机关事务部门。他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本领使其得以受宠。在文革“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使他成为机关专案组成员，去干校后在众多党员干部和知识份子中后来居上，担任母亲所在班的班长。别看这个小班长的职位，对于“一小撮”来说，他简直就是一手遮天的“审判官”。被斗对象的态度好坏，全由他的喜恶去评估，汇报，处置。他有权把对问题最大的朱某加的斗争缩小到五个“一小撮”内，也有权把对问题等而下之的母亲的斗争扩大到连级。谁对他恭维备至，谁就可被释放；谁不满足他的压迫感征服欲，谁就遭殃。可见，一个完全不受法律制约，权欲熏心的“审判官”必然会把敢于不服的母亲判为“阶下囚”。

女将王某华是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半文盲妇人，比母亲小5—6岁，文革时是机关后勤人员，据说当年是解放区的妇救会干部，有着斗地主的光荣革命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科长的丈夫病逝给她留下四个儿女，生活骤然拮据。她时常以老革命自居，指责单位领导对她的家庭照顾太少，还以大老粗为荣，讥讽知识份子，成天骂骂咧咧。出身不好而家庭情况日益好转的母亲总是她任意发泄的对象。母亲回家时常告诉我王对她无缘无故的歇斯底里。考虑到王某华无文化和其家庭处境，母亲只得忍气吞声，不与她一般见识。在群众斗群众的年代，王某华面对着自己长期的嫉恨对象，名正言顺地倾泄心中的怨毒。据我所知，母亲得知我抽调回城兴奋之极之事就是她汇报的，击退“地主份子”的猖狂进攻日是她的开心之时，也让她这个半文盲有了用武之地。

我看到，王某平王某华这两位心怀叵测的新老革命者，在名利妒火的驱使下，一唱一合，冠冕堂皇地接过了“革命”的口号，塞进自己的私货，对多年的同僚大打出手，表现出嗜虐者的快意。他们一个是小知份子，一个是无知识者，而身为高级知份子权威的朱某加也狼狽为奸，加入了扼杀善良和人性的行列。朱某加本也是无辜进入“一小撮”，为了保全自己，设法过关无可非议。违背伦理道德的是，得以走出“牛棚”却不忘造谣中伤，落井下石，加害他人。且看他在苟且偷生的路上走了有多远？母亲的周围有三位这样的助纣为虐者，岂可逃脱灭顶之

灾。他们难道不是灾难形成的基础和土壤，他们会有对良心和道德的反省之日吗？

三十年了，我已从谎言和愚昧中解脱，我已不再从母亲的脾气和个性中寻找加害于她的理由。我终于懂得，在法制的前提下，人人有维护自身性格的权力。扼杀异种个性，嘶杀同胞，永为历史谴责。我还深深懂得，没有母亲坚强的性格，就没有我们兄妹四人的今天。诚然，她维护自身政治生命的辩解使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是作恶者的罪过。如今在法庭席上，被告人的自辩和被告律师的出现不是对往日辩护被视为要“抗拒从严”行动的绝对否定吗？

怀念母亲，我希望告诉后代发生在我们家族史上不能遗忘的悲剧。我愿向后辈推崇诚实善良的为人，独立思考的理性。任何时候不可为强权和私利出卖正义和良心；当有人被打翻在地，你不必匆匆再踏上一只脚——倒地者何罪之有，自有法律公断。那是为了我们的后人免遭先辈的苦难，也为了王某平王某华可能拥有巨资家产和叛逆性格子孙的合法生存。

我毫不怀疑，在有生之年，母亲无辜“服刑”的沉冤终会大白。我将带上历史的公决告慰母亲的亡灵：安息吧，我亲爱的母亲！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